Tittle: 給台灣人的歷史課

Chapters:

Part 1: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應該不清楚的壞鄰居底細

不要瞎掰好嗎?-----中國民族主義的流變與不嚴謹

資源的匱乏造就掠奪者-----日本擴張主義始末

在沙漠裡種鬱金香----為何讓中國民主化很困難?

不沉的自由航母?----台灣的特殊位置

Part2:達摩克利斯之劍-----終須面對的兩岸難題

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式軍事霸權主義崛起? 學者的危言聳聽?

西貢大撤退----美國軍事投射力量的極限

自由與民主的後盾------去武裝的脆弱西歐國家

下一個香港----糟糕的比喻和政治宣傳

Part3:自由的土地和怯弱者的家園?-----對外態度與外交行動

盟友還是砲灰?----美台的利益連結

撿到槍的發言人----對中共態度該如何調整?

武裝自己或是投降等隊友?-----國防政策的侷限

Part4:愚者國度-----假新聞和真白癡

中資新聞洗腦中?------假新聞，自由世界的最大敵人

愚民政策----糟糕的教育體制與不負責的學生與老師

反抗與順從---新時代的資訊如何可靠?

爸媽長輩都是笨蛋?----為什麼他們喜歡韓國瑜?

消失的保守主義與務實主義-----為什麼不該改國號?

山寨貨

序

生產決定你的階級

地理環境的詛咒:

命運對個人不是絕對的，但是對一群人卻是，而且很難被逆轉。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幾年前的一部暴力動作電影:斯巴達與300壯士，以及它的續集，裡面的斯巴達軍隊都是職業部隊，這些滿身肌肉的硬漢都是自小受訓的專業戰士，他們不用種田或是打獵捕魚，出生到死亡都握著刀劍搏殺。問題來了，他們吃什麼?西元前可沒有蛋白粉和大量雞胸肉給他們灌，那他們不可能生來就是一身肌肉然後不用吃飯吧?答案很簡單，黑勞士，一種農業奴隸，佔據斯巴達大部分人口。

斯巴達人奴役黑勞士，在黑勞士暴動時男女老幼都要持刀劍鎮壓黑勞士，因為斯巴達總公民不過八千左右，接下來有自耕農和手工業者等”邊民”萬餘人，最後是黑勞士，估計有五萬人左右，甚至更多。

而雅典呢?在電影中雅典的軍隊體格就正常許多了，他們都是雅典城邦的公民，有手工業者、自耕農、商人、漁民等，受到戰爭動員才接受訓練上戰場，且在歷史上他們只夠格當輕步兵”peltast”，或是投石手及弓箭手，在戰爭中負責投擲標槍或任何物體騷擾敵人並在接戰後撤到兩翼，由較有錢的公民自備武器鎧甲的”hoplitai”重步兵接戰。

而且雅典也是民主制度的誕生處，有五百人議會和定時輪換的各個非專業行政官職。反觀斯巴達，是個不折不扣的專制階級國家，只有公民可以參政，但是這是個固化的階級(八千人的數字沒有增長太多過)，更別提高度依賴黑勞士作為經濟來源的”不公平”制度。

什麼造就了兩個國家體制的不同?解答很多，民族、語言、地形、文化差異等等。但我想用一個因素做為決定性的推手，並以此作為本書第一部分的主題:

地理環境造就生產方式與文化差異性。

而且我會證明這點在東亞也對歷史的發展有所影響。

講白話一點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希臘地區多石灰岩地形並不適合大規模農業生產，於是雅典城與比鄰地區能養活的人口不多，但是雅典城外就是一個大型港口，漁民和商賈通過這個港口進行生產活動，並培養了良好的航海技術。由於農業生產不足以滿足人口增長，許多希臘城邦會將多出來的人口組成遠征隊，帶著家鄉城邦議會廳火爐的火(這是一個傳統，就像台灣人從福建帶來馬祖等等的信仰一樣)，這個現象其實跟近代福建廣東沿海居民向東南亞移民的現象極度類似，福建也有天然港口和缺少耕地的現象。那時的福建海商可是名震一時，甚至在印尼建立了漢人政權(後來被荷蘭人打敗了)。同樣的道理，由於有對外推力和好的發展因素，希臘城邦在黑海、西西里島、南法(把法國看成六角形，約莫在最南端的角上)都建立了長期的殖民地政權，這個殖民用比較熟悉的方法可以理解成北美殖民模式，輸送過剩人口為主來建立文化前哨站。這些殖民地都與本城邦有聯繫，且能在貿易上互通有無。可以說，在羅馬崛起前，北地中海和黑海的貿易基本上由希臘人把持。貿易帶來兩個巨大的影響，一個是文化交流，希臘諸城邦都有與黑海文明、當時南法的高盧人、西西里島南方的腓尼基人(後來的迦太基)等互有貿易與文化往來，造就了希臘人能創造多元、豐富又有活力的文化，並且由於大量航海經驗，對地理和科學的認識也較為深刻。

航海需要定位，而在一望無際的海洋上定位需要完備的地理、天文知識，這激發著當時的科學家研究星體，研究地球，得出了地球是圓型的結論，以及計算航向方位需要幾何學，商業需要基礎的加乘法等等，這些科學理論都是古希臘科學的典型，都是有著實際需求背景而產生的，沒有理論會”無所理由”的出現，這一點需要銘記。在這個科學體系下，誕生了亞里斯督德、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學兼科學家，使古希臘成為西方文明的奠基石。

另一個貿易帶來的影響是，繁榮的商業以及階級流動。最早的雅典城是有僭主的，政治由貴族統治，但是在商業越發蓬勃發展後，大量的中產階級出現，許多人財富甚至超越地主。因此政治改革的呼聲出現了，一如大家比較熟悉的，英國資產階級在19世紀擴大選舉資格和進入下議會並逐漸領導政治一樣，一個西元前六世紀的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帶來了擴大議會人數，允許有錢但是非原貴族公民進入議會，傳統的世襲政治被打破，原有的部落-貴族體系影響力大不如前。這個改革要歸功於蓬勃的商業打破了地主資本累積的藩籬，讓沒有土地的人也能”發大財”，然後有資格影響決策，並進一步參與政治。

焦點放到斯巴達身上，它沒有天然良港意味著商業很難是主要生產活動，而且兩面環山代表對外交通的閉塞，文化交流較少。建立在農業奴隸制但是沒有夠多可耕地的情況下，核心人口很難增長，而核心人口少這點又導致階級制度必須嚴格執行，且核心人口需要軍事化以應對其他人的反抗。土地是只屬於公民的，黑勞士只負責耕作，邊民則可以擁有土地，而土地在農業社會象徵著財富和生產力，土地把持在同一階級下會產生更嚴重的階級固化現象。

再者，這個軍事化的國家自然不會多在乎個人意見了，軍事本身就是具有集中性和嚴格要求上下階級服從的行為，成為專制國家自然沒有甚麼意外，政治本就是強者為王，雅典的強者是有錢人，斯巴達的強者則是拳頭大的人。差別在於可能很多人的財富都極度富有而難分高下(當然，當時沒有壟斷的出現)，而你永遠能找到拳頭最硬的傢伙。

這要導出第一個未嚴謹證明的理論，然而我們在本書後續部分會擴充解釋這個理論使其符合於後面的例子。

這個理論有點長:

“海上商業國家能促進資本流通，而資本流通意味著財富不是高度集中的，也產生了較大的階級流動性。階級流動性和隨著貿易帶來的文化交流能為該國文明注入活性，通常思想更為豐富，政治上也較為民主。例子有，荷蘭、十八世紀後的英國、雅典等。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古老的農業國家常常是專制獨裁的帝國，難以流動的階級來自土地的兼併和自耕農的消亡，這些特徵使得東方帝國，或是大陸國家，很難自主發展出開明而分權的政府，土地集中帶來的中央集權特徵是顯著而難以否認的。

這段可能會引起兩個問題，第一:

為什麼斯巴達不鼓勵經商?可以獲取糧食和增進航海技術，至少可以建立海軍抵擋雅典啊?

斯巴達沒有好的貿易對象，它沒有殖民地城邦(公民一直都很少)，一部分需要歸結到它本來就是尚武的外來民族，所以基礎人口很少，又沒有條件擴張人口。民族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點，但它大部分時候是結果而非原因。

第二個問題可以把討論拉回東亞，並為本書主要內容揭開序幕:

為何福建廣東等地，依上文看擁有和希臘類似的地理條件，並且有輸出人口殖民的傳統，這些人口為何沒有形成一個文化圈或是長期存在的獨立政權?閩浙海商富可敵國，主宰了十六世紀以後的，也就是與歐洲國家的貿易。但為何貿易沒有上升到使文化進一步特化發展的程度?

鄭氏父子確實做到了建立海上政權這點，鄭芝龍統合各路海商賊寇，但被朝廷招安。鄭成功割據台灣，倚仗海軍和貿易雄霸一方數年。鄭氏政權終結於清朝海軍之手，也就是被中央政權剿滅了。在一個單極的地緣政治體系下，也就是在中國中央政權強大之下，地方很難依仗這個優勢建立政權，無法建立足夠的生產力和軍事力量抵禦中央政權的動員能力，文化也很難脫離中原儒家文化(當然不是典型意義的儒家)的影響，因為文化是具有傳染性和黏著性的，它會隨著人們傳播，但當日子久了它又不易改變，除非給予夠大的衝擊迫使人們放棄或是改變自己的傳統，就像日本的黑船事件以及鴉片戰爭一般。

史學家和當代政治家很常拿雅典、斯巴達的例子來闡述民主與專制的對抗，也就是本書後面會探討的”修習底德陷阱”，雅典發展的民主也是很常被討論的主題，包括它的民主如何走向自我滅亡的道路。一方面由於雅典象徵著西方文明之始，所以西方史家鍾情於闡述它的細節、它的獨特與優美以及它之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意義，一如文藝復興時期各路學者對古希臘經典細細鑽研、奉若至寶似的態度。

另一個原因是雅典和斯巴達的這段歷史可以撇去很多外來因素的影響，它沒有游牧民族的不定時威脅(波斯不算是游牧民族)、沒有顯著的多民族矛盾和沒有極大的宗教影響，甚至地中海的海況都相對於大西洋平靜許多，都促成了雅典的出現和蓬勃發展，也讓問題簡化許多。

中國大陸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它有著所有問題，有著麻煩的鄰居和不平靜的大海。當然，這些都會在下一章節進行討論。

這一章作為開頭只傳遞幾個概念，但請記住這幾個概念，他們看似簡單又欠缺說服力，卻又一再出現在歷史的視線內。

不要瞎掰好嗎?-----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

中國不是個自然的名詞，當然，所有名詞都是被創造的，但是”中國”這個概念並非源自五千年前的悠久歷史。

事實上它的存在時間可能沒有馬克思的資本論長。中原王朝一直都是確實存在的政治實體，然而其一統性和民族性是如何被激發的?如果”中國”這個詞不存在，為何歷代王朝能表現出如此規律?

所以我們需要帶入”非中國”的元素來與中原王朝互動，你需要多於一個以上的互動者才能有你我之分的概念，對吧?這對手便是熟悉又陌生的各個草原遊牧民族。他們的長期侵擾使的中原地區從一盤散沙變成了一個整合的農業帝國，一個必定是專制集中但又不完全緊密的有機體，一個應對威脅的人造產物。

民族的定義本身就是人造的，所以地緣政治所促使的政權建立與崩毀，與其中的規律，需要被釐清並且作為許多政治決策的終極驅動力。事實上，民族主義本身就是被地緣政治需求所創造的產物，許多人認為是民族主義形塑著政治，其實恰恰相反。民族主義是個政治工具，而我們可以先帶入第一個概念，中華--塞外民族的二元式民族主義，請注意，比起民族主義的特質，生產方式的區別更是這個概念的核心，而非被大量用於民族主義討論的語言、文化等特質。

先從一個比較常見的例子開始，戰國策中記述的秦趙長平之戰，秦軍男子但凡十五皆持刀上陣，以五十萬兵力擊敗趙國，坑殺趙國二十四萬戰俘。這場戰役奠基了秦統一全國的基礎，也是戰國後期最重要的戰役之一。這裡需要注意，數字並不重要，因為古時打仗數字虛假可能性很高，而且當時的生產能力支持不了如此規模的大戰，至少趙國人數有灌水。

然而即便如此，兩國的動員能力仍十分強大，秦國史實上至少動員了四十萬男丁，趙國至少也能擠出三十萬以內，當然，需要注意中國史書中的部隊編制並不明確，因而光從戰國策中的人數不能估算正面戰場皆敵的兵卒和後勤的伙夫分別是多少。然而如此動員率和作戰規模是很驚人的，高過二戰末期德國動員率。相比同期的西方的羅馬城仍在步履蹣跚的站穩腳跟，等到它們也動員了一場傾盡國力的戰爭----坎尼會戰(共動員七萬公民軍團，四萬外籍輔助部隊)，已經是漢朝左右的事了。當然這只能顯示秦國動員能力高且生產力強大足以維持後勤補給，是個同時代而言極強的戰爭機器，也顯示秦朝行政制度發展的先進。

時間拉回幾十年前，韓趙魏三家分晉後，趙國得到最大的土地， 人口由於生產技術革新以及土地面積大也較多，在長平之戰前趙國的常備軍是唯一能威脅秦國的單一軍事力量，且戰力不俗，秦國盡了全國之力才打敗他們。這一點歸功於長期對匈奴人作戰，使其擁有尚武傳統以及較發達的軍事科技，相較於東方更為富庶人口更大的齊國，卻沒辦法動員武裝能媲美趙軍的軍隊，直到秦統一為止齊國未動員與趙國在長平之戰的戰力與秦對抗。許多人讀戰國史時會忽略匈奴的存在，事實上匈奴直到南北朝為止都對中國政局影響頗深。

由於長期與匈奴作戰，趙軍首先在趙武靈王時”胡服騎射”，這裡的胡服指的是窄袖長褲的裝扮，在春秋甚至更早時期，中原人的標準服飾是深衣，就像古裝劇裡面的標準詩人或官員服飾，寬袍大袖，不利於在馬上搭弓射箭。

匈奴等草原民族，如接著在歷史舞台登場的鮮卑、羌人、蒙古、女真、突厥等一樣，不停地給予中原文化衝擊，這個衝擊是多面向的，而且是好壞影響皆有的，並且對中原發展模式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草原游牧民族一直對中原王朝產生巨大威脅，這不是個特例，而是世界史的常態，簡單解釋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武裝能力和動員能力總是高過農業國家，畢竟可以做到全民皆兵且機動性強，在火槍出現前機動性強大的騎兵一直對農業國家隨意徵招的農夫長矛兵(這真的是戰爭史中最常出現的組合，因為它是最低廉的搭配)，甚至是披甲的步兵有極大威脅。當然，強大的中原王朝想出了很多對付草原游牧民族的手段，而這些手段都成為改變歷史走向的重要因素，請注意這並不是絕對的決定性因素。

秦朝的手段很簡單，近幾年也是廣為國際討論的外交方案:Build a great wall ，蓋長城，並且搭配三十萬秦國正規軍清剿匈奴。蓋長城耗費巨資，當然他們不是從零開始，不然估計它需要現代的中國建設能力才能在合理成本下完成工作。秦長城是趙長城和燕長城連接修補而成的，其基本沿著氣候分界線建造，牆內是合適於農業生產的土地，牆外則是荒漠與草原等地形，這不是偶然，農業文明總是在草原前止步，生產方式在此畫了天然疆界。即便是修補，耗費人力還是十分驚人，當時光是在驪山修陵墓的囚犯工人就有二十萬之鉅，一磚一瓦搭出來的長城將耗費數百萬”人次”的人力，並且很大程度壓榨了底層人民的利益。這個解決方案需要一個擁有強大動員能力的中央政權才能達到，還需要一支強大的中央職業軍隊，一般臨時徵招的農夫兵不可能放下自己的莊稼跑到千里外衝殺匈奴。當然，強大的中央政府和職業軍隊不是為了匈奴而生，這套體制是為了統一六國而生，。但是匈奴的存在使的這套體制必須繼續實施，還需要擴大一倍以上，但請注意，這是一支徵兵制的部隊，核心組成是秦國長期服役征戰的青壯男子。體制改革在有草原民族威脅的情形下近乎不可能，中央集權是必須的，即便這個王朝是地大物博，若不統合力量對外，它的能力會很弱小，小到必須屈辱的屈服於可汗與單于，這會在下一個解決方案體現。

秦朝的下場也是由於這個解決方案的侷限性，大量部隊駐外導致國內空虛，長城建設帶來的繇役稅賦讓人民難以承受，陳勝、吳廣起義時勢不可擋，連破數城直達函谷關，其中基本沒有遇到抵抗，直到在名將章邯領兵下才擊潰農民起義軍。但是起義已經勢不可擋，各路諸侯貴族紛紛重新稱王，各路梟雄四處征伐討滅秦王朝，給短命的秦王朝蓋上了棺材板。

漢初，劉邦欲效法秦國的解決方案，漢高祖六年，他親領著大軍十萬，清剿匈奴。結果不幸的兵敗被圍，最後僥倖逃出生天，史稱白登之圍。從此漢朝長期不敢與匈奴為敵，只能和親進貢以維持和平的假象。漢朝初期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極弱，由於劉邦為爭取民眾支持其統治合法性，宣布降低賦稅繇役，以道家無為而治之道讓國家恢復，各路諸侯表面臣服中央，然而卻不完全效忠漢室，漢王朝又無力使其移交統治權。結果呢?漢初一直都沒有能力出兵與匈奴一戰的能力，必須一直維持和親政策和進貢。各諸侯國沒有外交權，也需要向中央繳稅，但是有較大的財政和軍事自主權，決策也較少被中央影響。這個模式重複的在中國出現，晉初的八王、唐的節度使甚至是1930年代的民國軍閥，這些時期的中國都受到外國不同程度的侵略，後文會詳述這些經過。轉機發生在漢景帝的七王之亂，異姓諸侯國全部叛變，但是中央處變不驚，打敗數倍於中央軍的叛軍，一一平叛後重新收回了各地的統治權，設立州郡，中央指派各郡郡守，終於能統合各地的資源了。

景帝死後武帝繼位，他更進一步統合國內經濟力量，發布鹽鐵官賣的法律，掌握了兩項重要的財政收入，當時許多民眾靠著賣鹽鐵得到了富可敵國的資產，然而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容不下這些國家級的富商的。武帝在位時三征匈奴，徹底使匈奴失去騷擾王朝邊境的能力，元氣大傷。漢朝本身也是耗費鉅資，然而這個王朝已經完成中央集權以及他的歷史使命---擊退草原民族。

同時期沒有其他農業文明能武裝出夠多的部隊直擊游牧民族的老巢，漢帝國動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和人力，武裝出了足夠的騎兵部隊來擊潰令人聞風喪膽的匈奴騎手，這是超越同時代技術限制的行為。這是體制與國家大小的勝利，先進的動員體制和國家管制的經濟、龐大的人口支撐軍事負擔，各個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是一個龐然巨獸的勝利，但注意，草原游牧民族仍在等待更好時機中。

晉初剛完成統一後，晉武帝司馬炎害怕中央會如東漢一般無人支援內亂，於是廢州郡廣設同姓異姓諸侯王，以諸侯為單位統治各地以保障中央統治。這個體制確保中央權威的同時能保證在內憂外患時，也姓”司馬”的好親戚會來幫自己的子孫一把。

同時，這個時期對草原民族的解決方案很簡單，設置郡縣，分而治之。早在曹魏時期就進行過一次對草原民族的清剿，並將匈奴分成三部，不准他們聯合起來，晉朝沿用這個方案。並大規模使用少數民族的騎兵於作戰中，這個模式和其後果很像西羅馬帝國後期軍隊大規模招募日耳曼蠻族為兵一樣。蠻族總是比農業民族更為善戰，但是需要記住他們的文化認同通常不會被輕易改變，當兵往往只是混一口飯吃罷了。

結果晉武帝可能老了判斷失準，他的兒子晉惠帝(沒錯，就是何不食肉糜那位)，立刻被他的叔叔伯伯暴打一頓，八王相繼奪取中央政權，皇后外戚濫權干政，搞得朝政混亂，內戰四起。一頓內耗後，王朝元氣大傷，而不幸的事情是蠻族部隊大幅替換了在戰爭中耗損的漢人軍隊，三個被分開的匈奴郡悄悄合併了。接著就是較廣為人知的五胡亂華時期，蠻族紛紛成立割據政權，分食中原王朝，進入南北朝時期。

注意接下來這一段，鮮卑政權北魏統一北方，後又分裂成北齊和北周，北周又被隋所竄，並進而統一全國。隋朝是個漢化鮮卑人的政權，更精確地說是漢化胡人與漢人的混合政權，統治階級有鮮卑武裝貴族和漢人世家大族為領導的文官體制。這個複合統治集團通常被稱為關隴集團，唐代的統治主體也是關隴集團。

然而，在這個民族融合以後，漢人已經不是更早的漢人了，血統上在唐代以後基本已經混血到難以分辨，文化上也吸納了大量西域的文化，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華文化。在這個時期，西域的飲食方式，西域的服飾，更為開放的女性權力都為古老文化添入了活水，就像馬其頓征服者為古老埃及帶來希臘文明一樣，改變是深刻而顯著的。

在這個節點來看，中原帝國吸收了它的老敵手們，唐代的軍事就相當程度仰賴騎兵，騎射尚武的傳統在晉朝滅亡後慢慢被寫進北方人民的基因中了。仰賴著繼承於隋與北魏的軍事力量，唐朝的對外解決方案很直觀暴力，就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職業部隊，但這是由於更早的變種征兵制，也就是府兵制和均田制不可避免的崩潰導致的。連年征戰會導致徵兵制徵募的農夫無法顧及自己的莊稼而導致土地荒蕪或是遭到地主兼併，進而導致國家被迫轉向職業化軍隊，也就是募兵制，這可以確保他們不會因為服役而無法謀生，這個現象可以在羅馬共和國在西元前107年”蓋屋斯 馬略”的馬略改革中看到，羅馬遭受到類似的問題，並給出了同樣的答案，羅馬共和在該次改革後轉向全募兵制。

在這裡我們停下腳步，看一眼這些王朝走過的路，北方游牧民族的壓力迫使他們成為中央集權的，顯著軍事化的，難以分權的。那些草原民族就像是篩選者，入侵劫掠那些不夠格擋住他們的王朝，促使他們中央集權，集中全國財富以抵禦這些掠食者，中央集權的特色由此加固。我們還可以觀察到未來的北方鄰居--沙俄帝國，得到了相近的問題和答案。

在此我相信很多人不會買帳，光是單一因素導致一個國家長期維持中央集權而非鬆散分權的，說服力明顯不夠。我要在這裡引入第二個因素:地理，以及其造就的內政模式。

歷代中原王朝的發展模式都略有差異，不變的規律是通常管轄範圍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南方沒有強大的外敵所以通常王朝的統治可以遠達如今越南一帶。把焦點先放在南方，南方氣候區多雨濕潤，一年最高可收穫三次，比起黃河流域的最高一年兩次有明顯的差異。強大的生產力和較為安定的邊境造就了良好的發展，從三國時孫吳平定百越為始南方開始穩固發展，到了五胡亂華時期又接收了北方來的難民，人口由此超越北方(此時北方也因戰亂人口銳減)。直到隋朝，實際生產和人口中心移到了南方。此時一項重要的建設加固了中原王朝的統治力和經濟統合能力，那就是京杭大運河。

大運河允許王朝將南方的財富源源不絕的送往北方，並且加強了對南方軍事調度能力和實際行政管轄力。我們可以看到，隋煬帝下揚州巡視，就是皇權的延伸，不然歷代皇帝很少去過南方(如果他們一直都是北方的軍事首領)，許多南方官員可能一輩子沒見過皇帝。

這裡可能會有人有疑問，為什麼南方不仰賴他們的經濟優勢獨立呢?這個問題很簡單，南方不產馬，沒有騎兵，即便有馬也很難大量繁殖，因為緯度和氣候不對。而一但考量進冷兵器時代的騎兵優勢，南方割據政權很難，也幾乎沒有，成功抵禦來自北方的壓力，六朝和南宋即便是偏安，終究得被有騎兵的北方人擊潰。南方很難統一北方，北方又覬覦南方的財富而有了統一的原動力，似乎長江這個地理屏障擋不住人們對權力和財富的渴望，或是北方的馬蹄。

撇開南北分治的可能，中國的天然地形也很難允許其他種類的割據政權存在，四川是個例外，它佔據天險，許多時候會產生小型軍閥政權，然而他們仍然被困在大中原王朝的一角，難以發展更多的政治、生產力獨特性。

我認為上述的經濟、地形與外族威脅，都是驅動著王朝統一的動力，這是地緣政治的必然產物。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抹去歷次對外戰爭中，在有了你我的概念後被宣傳的民族概念，也就是中華--塞外民族的二元式民族主義。然而這並不絕對，也不自然。而且綜觀以上歷史，沒有政治決定是純粹依照民族而做的，地緣政治和統治需求占了更大比重，這點非常重要。

我要否定中國人和中華民族這兩個概念的絕對性和嚴謹性，我不否定應用他們在論述以及探討政治、歷史的用途，然而它們的人造成分遠高過自然劃分的促成性。我會否定這兩個概念在東亞地緣政治影響性和正統性，至少是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央王朝政權的擴張與固守的驅動性比起民族主義(nationalism)更能讓人理解歷代政權的種種對外行動。

從唐代建立與關隴集團建立的時間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的概念變得尷尬而奇怪，誰屬於這個範疇?一個比較合理的範疇是，接受儒家文化並認同儒家文化，並同時居住在中國固有領土(保守的來說是中原，北至內蒙古，南至百越，更保守是計算到長江流域)。

你並不能用血統來定義中華民族，因為這個時間點胡人的加入使客觀的基因不能保持與之前相同的基因特徵，文化上也受到胡人的介入導致其不純潔性。當然很多人會反駁這個論調，他們認為這些擾動不影響整體文化的延續，只要生在中原王朝統治過的地盤上，即便現在中央政權不擁有實際統治權，你都會被算到中國人裡面，而且不只是文化上的意義，上升到了政治歸屬等級。這個分類聽起來野蠻粗暴，而且很不講理，就像韓粉一樣。

這裡引用知名史學家”艾瑞克 霍布斯邦”的著作---”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對民族的描述，簡略濃縮可以說出，民族應當是很大程度上基於語言而形成的，並且還有現實地緣政治以及現實需求的推動，這是他書中的一個論點。他闡述了德意志的統一，是基於德語文化以及德語知識菁英的推動，使得不是日耳曼人但是講德語並且佔有柏蘭登堡地區的”普魯士”政權，成為統合德意志地區的推手。

事實上，德意志地區的地域差異性比你想像的高，而且劃分也十分不嚴謹，比較特殊的像是巴伐利亞，從德意志帝國為始，經過威瑪共和國、第三帝國，到現在都是自治州，一直都有自己的議會，且當地人多講方言而非德語。事實上，在瑞士德語區(瑞士分為德語區和法語區)的瑞士人可能比起巴伐利亞人更能跟剩下的德國人溝通。德國的統一更大程度是地緣政治上的縱橫捭闔，俾斯麥的巧妙謀劃、北德意志關稅同盟以及德語知識分子對統一強大帝國的浪漫想像，遠比文化認同本身效力大很多，而這些都是人為的(這個人為是相對於沒有強制傳播某種文化的自然)，德意志是個想像的名詞，成為了一個甚至不是日耳曼人控制的政治實體，普魯士血統和語言文化事實上更接近他們的波羅地海兄弟，波蘭和立陶宛人。

基於地緣政治需求創造民族認同是必須的，對於中原王朝而言這種號召對於統治正統性很有意義，然而”中國皇帝沒有中國這個名詞的概念”，請注意到我在梳理唐代為止游牧對抗簡史都沒有用到中國二字，因為我認為在這裡使用中國二字是不嚴謹而且時序混亂的，翻一翻所有史料，中國這個名詞是在民國後被孫文AKA孫大砲創造的，沒有皇帝用過中國這個稱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那個時代的民族主義大劍，更明確的說是皇權主義，劃分你我的是效忠的政權而非認同的文化，影響效力大小的是王朝的力量而非文化的傳播，這是地緣政治實力的體現。

一個在陝西的農夫不知道什麼是儒家文化，一個閩浙的商人只管能不能賺到錢，一個唐朝的職業步兵可能沒考慮過殺人以外的事情，但是他們都被算進中華民族的行列，因為陝西農夫繳稅給中原王朝，閩浙商人要看中央政府的臉色來做生意，軍人則直接為王朝賣命。

這些個論述主體是取自艾瑞克 霍布斯邦”的著作---”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對德意志地區還有瑞典地區的農民的討論。當然，請注意，我並沒有在否認這兩個名詞，它們是很方便的代稱，很直觀易於理解的概念。但是你不會在討論凱爾特人(古法國的住民)時為他們的酋長的稱號前面加上法國二字，因為法國作為政權或是民族代稱那時候不存在。但你確實能用地理名詞意義上的法國二字來描述他們，這是較為嚴謹的作法，但儘管說我是吹毛求疵吧。

至少剔除了中國人和中華民族嚴謹性和絕對性，討論會變得更現實主義一點，這兩個現代產物並不能建立任何對過去王朝遺產的統治正統性闡述，而且近現代的討論需要撇除文化這個大課題，因為一但放上中華文化這個大旗會蒙蔽很多視野，包括近現代中國的外交與內政行動的終極驅動因素，那個看似浪漫但又極度現實主義的原因，一個包裹在民族文化糖衣下的原始慾望。

把視野和討論放到純粹地緣政治的範疇後，我希望後面出現的”中國”都作為地理名詞，並且很幸運的，在新中國切斷與過去的文化連結後，我們可以減少討論儒道混合文化對人們的影響，這有助於簡化問題。

好了，我們現在很不講理的把中國這個概念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的簡稱，中華民族是個宣傳出來的概念(這個假設離事實並不遙遠)，這個新興民族主義從何而來?又將把中國引向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最早的民族主義倡導者可以追朔到家喻戶曉的孫文AKA孫大砲，他在清末領導革命時喊過一句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誰是韃虜?當然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最後一個突破農業國家防禦的草原民族，滿族人。可以注意到朱元璋也喊過同樣的口號，他也想驅逐蒙古統治者，這個中華--塞外民族的二元式民族主義是基於文化與生產方式差異而造就的，也是在前述討論歷代王朝歷史中展現的，地緣政治需求的產物。這可以顯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排外的，是一種保守的，它包容著能融入這個體系，也就是農業帝國體系的所有元素，然而對外是敵意的，排斥的心理。

對朱元璋以及它的前輩們來說，只有農業民族和非農業民族之別，對孫文來說，卻變成了漢人以及非漢人的區別。你可以看到，中華--塞外民族的二元式民族主義在清朝受到改寫，甚麼改寫了它?

事實上變異的開端發生在元末明初，新的元素進入了中原王朝政治體系，那就是阿拉伯商人，也就是大家較為熟悉的色目人。這個商業階級的出現在元朝的政治體制中占有僅次於蒙古人的地位，並且名目張膽的壓了漢人，也就是傳統王朝的遺民們一等。朱元璋驅逐韃虜時也順便屠殺了聚居在廣州的大量色目人，許多人幸運的隱性埋名躲了起來，既便如此死傷也有二十萬之鉅。

色目人的出現破壞了中華--塞外民族的二元式民族主義，這使得漢人這個概念更被確立，在此之前，他們是一個農業帝國臣民的代稱，現在則需要打破生產方式以及邊界的束縛了，受到儒道混和文化的子民，黃皮膚黑眼睛的，使用漢文溝通書寫的，就是漢人。請注意，這裡需要極度小心於看待這個概念的影響範圍，就如同對農夫海商以及士兵的那段比喻一樣，這個概念是大部分只存在知識階級的，就如同1840年代的德意志地區德語知識菁英一樣，他們主宰著歷史的潮流，然而結果往往怪異而不自然，國與國的疆界仍然被地緣政治的力量所左右，只不過民族主義是極佳的動員工具罷了。

回到清朝，情況比起元朝更為複雜。滿清核心人口極少，八旗旗民入關時不過十萬人，他們需要仰賴其他元素來支撐這個大帝國，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的，否則人數占優的漢人很快就會佔據政治優勢。他們選擇了兩個盟友，一個是蒙古騎兵，他們給與蒙古人特權和經濟福利，讓他們為帝國效忠戰鬥，並同時在軍事和政治上制約漢人官員。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蒙古將領僧格林沁和蒙古騎兵在八里橋之役中對抗英法槍砲，他們勇猛的衝進敵陣，成功砍死三個步槍兵，對，你沒看錯，英法這役總共損失五人。僧格林沁後轉進逃跑，蒙古騎兵損失慘重。

另一個盟友是西藏人，西藏願意歸屬中央是因為清朝支持藏傳佛教，西藏保持歸屬於中央並維持地方穩定，中央給予認同和寬容得自治權。不然在清朝以前，西藏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清朝它也以藩屬的方式存在於中原王朝，而非直接統治，這點需要銘記。

還有一個新民族出現在清帝國中，那就是西北邊疆的回民，現在稱他們是維吾爾族，他們在清朝中葉大概有一千萬的人口。他們是中亞游牧民族受到伊斯蘭同化後的產物，被清朝統治後一直聚居在西北，後來發生過一次”同治回亂”，建立暫時割據政權，不過很快被左宗棠和湘軍擊潰了，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並會在後面展開討論。

順帶一提，如果有看過周星馳電影”武狀元 蘇乞兒”的人，可能可以回想到僧格林沁作為反派出現在那部電影中，這個'名字不是電影瞎掰的。

焦點放回孫文AKA孫大砲，它的韃虜範圍基本上就是非漢人，上述的所有種族都是韃虜，這個範圍和複雜度高過朱元璋的韃虜。注意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細節，湖北軍政府成立後，使用的旗是鐵血十八星陸軍旗，它的九個角代表九州，也就是古代對中國疆域的代稱，十八星代表十八個漢人省分，排除了東三省和西藏、新疆，西北省分等地。這是個很重要的歷史時刻，這面旗代表孫文眼中的中國，代表他的民族主義定義。後來有人抗議這個設計，因為東三省在清朝後半葉時移入大量漢人，應該將東三省化為一個星做代表，不過沒被採納。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五色旗，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這個是基於對少數民族處理政策不同的設計。它作為北洋政府的國旗持續很長時間，直到國民政府北伐後才被青天白日滿地紅取代。

五族共和這個概念在此時取代了漢人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包含範疇，這是由於在1912年臨時參議會決定使用五色旗。即便這個概念很怪異，但請注意它是個很常見的現象，大民族吸納小民族在民族主義盛行的十九、二十世紀是很常見的，因為獨立的小民族很難成立民族國家並擁有足夠競爭力，像是加泰羅尼亞人、巴斯克人、鬆散的義大利半島居民等等，或是文化語言上處於弱勢而被吸納入主體民族，像是威爾士人等。

事情到這裡都很正常，但是一個重要的外來者攪亂了一切，打破了原本應當理性發展的政體以及民族主義，那就是萬惡的淵藪------大日本帝國AKA該死的鬼子。

日本在中國近現代史實在是過於重要，甚至放到東亞史甚至是世界史都必須談論日本。日本的獨特性以及它難以捉摸的外交內政決策，是值得一整個章節來探討的。我會綜合日本的行為來延伸並結束討論中國民族主義的走向，因為兩者是如此得緊密以至於分開討論會顯得不夠連貫。

帝國主義入侵者的部分我會放到再下一個章節，西方勢力的介入和民主一起談論更能將接近的概念進行比較，我也會引入當時西方的地緣政治作為輔助。

資源的匱乏造就掠奪者-----日本擴張主義始末

要令一個當代普通中國人平心靜氣討論日本歷史，有些知識分子可能做的很好，但是普通大眾通常是嗤之以鼻，日本侵略的傷痕還未被癒合，許多人被踐踏的記憶仍然存在，這必須被注意。然而許多非中國人不能理解這種糾結，無知或是同理心缺乏，抑或是單純的沒有相同經驗而難以產生連結，這都使”南京大屠殺情結”(這是我希望給這個受害者心理與記憶混合體一個名字，便於在後面討論)變成一種與我們陌生而遙遠的東西。

當然，筆者沒有這種阻隔，我會以旁觀者的角度訴說日本自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失敗的簡略故事，我會著重於地緣政治與日本國內政治，我不偏袒日本，我也絕不會隱晦於表現他們殘暴，只因這能襯托出本章主題-----資源匱乏與擴張。

首先從明治時期開始，而要談明治史，不能不提西鄉隆盛這個人，他是真正的常勝將軍，日本共和國的奠基者以及電影”最後的武士”中，與阿湯哥並肩作戰的反叛武士”勝元”的原型人物。

西鄉隆盛是薩摩藩的大將，在倒幕戰爭中薩摩藩的海陸軍起了極大作用，在大阪城之役擊潰政府軍主力，基本絕了政府軍的氣數，之後更是遠征蝦夷共和國，統一了全國。他的軍事才華在多場戰役中嶄露無遺，然而最後卻作為叛徒慘死在鹿兒島上。

西鄉隆盛之死和他發動的西南戰爭牽扯到第一個日本國策之爭，這個爭鬥便是安內與壤外的爭鬥，角力者分別是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拉到日本建國之初，戰爭的耗損需要時間復原，同時各地的大名仍擁有極大自主權，即便在戰爭中他們都支持天皇。為了使國家正常化，大名和原有的秩序需要被打破，尤其是經濟與軍事上的。

於是一連串改革出台，倒幕戰爭中的武士為主體的部隊被解散，各地大名被解除武裝和封地，廢藩置縣，政府則補償他們債券等微薄的利益。

新的軍隊被徵募，他們是農夫和商人而非武士階級，因為正常化的軍隊實施了徵兵制。而武士則隨著大名的消失而失去了地位，如今沒有國家支付俸祿，許多武士窮困潦倒，又沒有一技之長。廢刀令等法律更使武士連最基本的尊嚴都難以維持。西鄉隆盛，作為武士階級的代表，時常為武士階級發聲。他希望維持武士的尊嚴以及階級特殊性，這是一種浪漫、個人式的情懷，然而他確實代表了一股很大的既得利益者。大久保利通堅決反對這種行為，在他眼中日本必須堅決走向西化的道路，有很多傳統必須被切除。

西鄉隆盛是個行動派，他提出征討朝鮮，也就是征韓論。當時朝鮮閉關鎖國，除中國外不進行外交行動，只認中國這個大哥。日本建國後提出對韓建交，遭到否決。西鄉隆盛想要藉由征韓來解決武士失業問題，他甚至提出”自己作為使者前往韓國，故意激怒當地人被殺，製造開戰理由”。大久保利通為首的理性派強烈否決他的決策，當時日本百廢待興，經不起一場局部戰爭，更別提如果與清國開戰後果將不可設想。

在征韓論，一個解決武士失業問題與擴張領土的方案，被否決後，西鄉和一批傳統士族不滿辭官。大久保利通改為提出”征台論”來安撫武士階級，也就是後來的牡丹社事件起源。

當時台東被視為化外之地，清國並不對那裡的原住民族有管轄力，相對的就沒有侵害主權的問題。牡丹社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武士的不滿，事實上就是派出了數千武士，五十人戰死，五百人病死，效果是聊勝於無。

西鄉隆盛辭官後就在鹿兒島開設了鹿兒島軍事學校，招收對象多是士族與武士，形成了一股私人武裝。中央自然是不能容忍這種軍閥式的作為，然而礙於西鄉隆盛的威望不能公開的阻止或是譴責西鄉，西鄉此時儼然就是九州的無冕王，影響力在九州遠高過立足未穩的明治政府。大久保利通使了兩面手段，一方面派警察貼身監視西鄉，一方面密令讓人把鹿兒島的軍火庫搬走。這些伎倆被軍事學校的學員發現了，他們審問警察時甚至得知他們會伺機”暗殺”西鄉隆盛。一時間衝突爆發，學生們要求西鄉隆盛起兵”清君側”，反抗明治政府。西鄉半推半就的就發起了叛亂，他自己也未必真正想要武裝反抗中央，然而木已成舟，該戰爭史稱西南戰爭。同一時間各地士族與流浪武士紛紛響應發動叛變，戰火延燒整個九州，連本州都有零星的叛亂。西鄉以及他轄下的薩摩藩武士、軍事學校的學員戰鬥力遠高過當時的政府軍，在武器彈藥補給不足的情形下連戰皆捷，推進到熊本城並包圍該城，在先前戰役中甚至差點擊斃後來的台灣總督，當時的政府軍第十四步兵聯隊長，乃木希典。然而時間不站在西鄉隆盛的一側，政府軍的優勢補給和熊本城的久攻不下，讓薩摩軍耗盡補給和人力，在幾次圍剿後西鄉隆盛負傷，並最終在鹿兒島自殺，結束他傳奇的一生。在西南戰爭中死亡的士族和武士更大的減緩了社會矛盾，也很大程度建立了明治政府的威信，利於後續政策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軍中戰功顯赫的不是新編的陸軍單位，而是臨時徵招的警察部隊，通常是被收編的原武士階級，在戰場上肉搏能力和士氣遠高過正規軍。而且許多人是在倒幕戰爭中被薩摩藩打敗的武士，故而殺的特別起勁。這也顯示那句老話，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利益是永恆的。

征台論相對於征韓論的勝利，可以代表明治時期西化派對於傳統派的勝利，然而這不是生產力或是技術的區別，而是日本捨棄文化傳統全力走向西化的標竿，能革新古老階級使其符合現代國家的需求，也是為何日本的西化運動能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相對於同時期也在開展洋務運動的中國並未能達到這點。

莞爾之處在於，這個國內路線之爭不是侵略與和平之爭，而是如何侵略之爭，大久保利通可不是什麼和平主義者，他是務實的政治人物。更有趣之處在於他也是薩摩藩出身的，與西鄉隆盛是長期的好友，然而國家利益對他而言是至上的。大部分人比起大久保利通更喜歡西鄉隆盛，因為誰不喜歡一個軍功赫赫又充滿浪漫主義的英雄呢?至於大久保利通的結局，他在西南戰爭結束後不久被刺殺身亡，現在的知名度反倒不及西鄉隆盛這個”叛徒”。

回到正題，我們需要注意，以出兵外國領土來解決政治問題成為了一個常見選項，而且國內的路線之爭通常都是如何侵略而非是否侵略。資源匱乏、四面受敵的日本總是為了資源而打仗，這個規律將重複的體現，並形塑著直到1945年為止的東亞地緣政治。

翻轉日本國運的戰爭----甲午戰爭

時間來到二十年後，1890年代。許多人把日本在甲午戰爭的行動視為其後日本帝國侵略主義的主因，日本在這場仗贏得漂亮，而且獲得兩億兩白銀的賠款，換算成日元約有四億到五億，約為日本當時政府年度收入的四倍有餘。但是日本人不是因為在甲午嘗到甜頭才繼續侵略的，事實上他們在籌備甲午戰爭時就已經是賭上國運的準備。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征韓論吧?這次日本把矛頭指向原本不敢與之為敵的清國，歸功於西化派在這二十年對日本的建設，日本建立了教育體制並在甲午戰前令小學入學率高達五成以上，工商業蓬勃發展，並建立了穩定的銀本位貨幣機制利於外貿出口結算，這一點很特別。

插入一個小常識，日本盛產黃金，但是不量產白銀，故而在現代貨幣未出現前，白銀相對於黃金的價格很高。明清時期許多中國商人，包含鄭氏父子，都對日本人賣白銀來換黃金或是物資，這是一門暴利的買賣。當然，中國也不大量產白銀，白銀是從西班牙人的南美洲流入的。日本之所以使用銀本位是因為外國商人都喜歡用銀幣結算對日本的貿易，國際銀價比日本低很多所以相對金幣購買力較高，並使得受到貿易影響的日幣直接與銀價掛勾。同時間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是金本位，也就是以黃金擔保貨幣的價值。

回到正題，如何看出當時日本是以”賭博”的心態來打這場仗的?首先，這場仗是他們藉口朝鮮內亂而出兵介入的，他們並沒有這方面的國防壓力需要特意出兵朝鮮。他們認為他們的侵略是為了不被侵略，然而清國和朝鮮都是自顧不暇了，何談侵略?其實他們的終極目標是打敗俄國人，當時沙皇雖然在俄土戰爭吃了點虧，但是仍是歐亞第一軍事強國，海陸軍力量不可小覷，而且在介入巴爾幹半島受挫、德意志崛起後，沙俄的發展方向只剩下東方，事實上他們已經在中國東北興建鐵路並經濟上掌握了東北，繼續擴張在東亞的影響力。

為了能與沙俄一搏，日本需要夠多”賭資”，而這個”賭資”就需要從落後的清國身上榨取了。對當時弱小的日本而言，他們還是很看重清國的實力的，於是他們在二十年中戮力發展海軍，連天皇都要縮衣節食，拿出自己的財產造船、獎賞發展海軍有功的重臣、貴族。日本海軍的準備原本就是設計與大國艦隊一搏的，而非海防巡邏用的。首先，他們大力發展魚雷以及潛艇這些新銳技術。日本的魚雷技術即使到二戰末期依然是世界領先的，甚至遠高過美國，因為他們很喜歡魚雷這種以小成本造成大傷害的武器，故而大力投入研究。第二項是艦隊的砲艦，松島級的三艘特別找法國人訂做的防衛巡洋艦，他們不尋常的在艦尾安置一門320mm大口徑艦砲，要知道中國主力鐵甲艦定遠、鎮遠兩艦的主砲也才只有305mm而已，而松島級的噸位只是略超過定遠的一半而已。這種近乎瘋狂的武裝，是將資源匱乏的海軍戰鬥力最大化的追求(實際上未必比較強就是了)。

第三項特點就是常被人拿來說嘴的速射砲，各個口徑，能夠從砲閥快速手動裝填定裝彈藥的火砲皆歸於此類範疇，事實上這也是使日本艦隊小船打出大投射量的手段之一，在海戰中射速的優勢確實很驚人。北洋艦隊為甚麼沒有速射砲?主要是因為比較貴而且許多人並不理解現代海戰的需求。事實上李鴻章應該明白這道理，但是朝廷不願意給他多撥錢，而且他自己也明白，北洋艦隊更多成分上是個紙老虎，以龐大噸位彰顯清朝國力罷了。

剛開戰時各國都看好清國，沒看錯，事實上你可以去翻當年歐美國家的報紙，在戰爭前期的報導都是看好清國會打贏這場戰爭的，所以日本在最後的勝利是許多人無法想像的。戰爭的過程以及清國軍隊如何糟糕的打敗仗已經被過多次提過了，我不做贅述。值得討論的是清國國內態度，其實李鴻章是以東北一省之力來打日本人，他的調動權僅有手下的淮軍以及北洋艦隊，還有地方守備軍，其餘各省並未在戰爭中給予軍事援助。最有名的例子是當時南洋艦隊掌管者張之洞，此人為極度守舊，而且與李鴻章素來在朝政不和。在海戰正酣之際，張之洞以南方需要海防任務及船隻故障等藉口拒絕給李鴻章增援，最終導致北洋艦隊全面覆滅。其餘各省，及便是以漢人為總督或是巡撫的東南諸省，皆未給予李鴻章援助。由此可見，要說此時中國有民族主義，或許太過天真。事實上，甲午戰爭中受到日本侵略影響最深的也只有東北一省，其餘省分除了稅負增加，絲毫對”日本侵略者”沒有任何感受，甚至不會知曉。知道此事的漢人菁英階級也未展現對外來者的敵意，事實上，政治利益比起民族大義有意義太多了，而且他們是否意識到民族大義這點都值得推敲。

後世，也就是近現代的中國人，常喜歡把日本在甲午對中國的侵略說得十惡不赦，而且是帶有濃厚民族主義情感的。你不能把當代的情緒與政治宣傳帶到1890年那個民族主義在中國不盛行的年代，這是有失專業的時序混亂，就像你不會用當代道德約束西元前1000年的野蠻人一樣。甲午戰爭是地緣政治的衝突，新興的國家挑戰原有秩序的維護者並攫取利益，跟民族大義沒有關係，戰爭的發動者估計也沒想過會被後世如此詮釋。

事實上如果當時的清國有統治階級考慮到民族大義，就不會草草的投降而是死戰到底。到了戰爭末期仍有西方觀察家認為清國會打贏，因為日本當時快把錢打光了，國內的儲備資產基本耗盡，要是戰爭再持續哪怕是三個月，煤鐵砲彈、船舶維護等急需外來勢力幫助的資源都將隨著資產耗盡而中止，日本國內也不產夠多的鐵礦能支持戰爭工業。連日本人都做好可能要停戰的準備了。

但是懦弱的光緒帝無視於李鴻章的建議，在艦隊覆滅不久後投降，事實上以當時中國的人力和資源，能把日本再耗上一年都不成問題，但是當時的統治者只想保持自己的皇位，反正缺錢就加稅，僅此爾爾。

日本人贏了，翻轉了國運。而且他們極具智慧的運用這筆”不義之財"，為國家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八成投入軍事發展，九成海軍一成陸軍，陸軍從十萬多人擴充到三十萬人以上，並購買大量外國'船艦火炮，海軍的經費讓日本聯合艦隊到二戰時能有與美國大戰的機會。剩下的兩成，一部分投入教育，使得日本是最早消滅文盲的國家。另一部分改革經濟，作為準備金來使政府從銀本位轉換到金本位(也就是當時大部分現代化國家奉行的，許多國家在大蕭條時期才取消)這個過程需要政府準備與發行日圓等值的黃金來擔保貨幣的價值。

金本位制使得日圓受到外資信任，外來投資連年增長，在一戰期間更是連年增長十個百分點以上，也歸功於在戰中為西方列強提供民生消費品和武器彈藥(主要是英國和俄國)的紅利，讓日本實施徹底的現代化。金本位制使的日本貨幣與國際接軌，並促進貿易的作用在長期上確保日本的經濟發展，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眼下在東亞還有一個巨大的障礙阻擋日本與先進大國，那就是剛剛提到的沙俄，所以接下來裡所當然的要討論1904日俄戰爭。

乙未割台的歷史我要放到台灣的部分講解，這不大算是日本擴張史而是台灣近代史，至少以影響來看。

鞏固日本國運的戰爭-----日俄戰爭

應該很少人看過1969年的日本電影”日本海大海戰”，描述日俄戰爭中海戰的整個過程，雖然沒有當代電影的特效，但是演員演技都是一等的，整體節奏和劇情都挺不錯的。筆者很喜歡劇中的一幕，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在旗艦三笠號上大喊”皇國興廢，在此一戰!”那確實是很震撼人心的一幕，而該次戰鬥也就是對馬海峽之戰，也確實賭上了日本的國運興廢。